

選委選舉回歸初心

何子文

港事講場

選舉委員會選舉提名期展開，這是新選制確立後的第一場選舉，也是香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下的第一場選舉。這場選舉不單將產生1500名選委，而且這次產生的選委將負責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又會參與提名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並且選出部分立法會議員，肩負更大的職責和使命。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選委選舉也要回歸選賢與能的初心，選出有能力的愛國者，為接下來的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奠定重要選民基礎，這對於香港政局重返正轨，對於「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都有重大的意義。

根據新選制，由1500人組成的選委會負責提名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及選出行政長官、選出其中40名立法會議員，以及提名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等事宜，擔負重要憲制職能。從選委選舉報名的情況來看，這次選委選舉最大特點在於去政治化，重新回歸選賢與能、均衡參與的初心。選委會設立的初衷就是讓不同界別、不同階層市民「均衡參與」，選委應該代表業界利益、表達團體訴求，整個選委會制度都是圍繞這些原則設計。但近幾屆選委會選舉卻完全變質，反對派為了在特首選舉中「造王」，大舉搶攻選委會界別，通過炒作政治議

題、挑動對立造勢。在反對派的操作下，令選委會選舉偏離了代表業界利益、表達團體訴求的初衷，成為「變相直選」，令選委選舉高度政治化，參選人互相攻訐，背離了選委選舉的初心。

扭轉泛政治風氣

改革後的選委選舉，正如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所言，必須確保「進入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的人都必須是愛國愛港者，絕不容許任何一個反中亂港分子通過任何途徑和方式混進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變成管治者。這是一條鐵的底線」。沒有了反對派攪局，參選者都是有心為香港服務，為業界發聲，有力地扭轉了選委選舉的泛政治風氣，讓選舉重回正轨。

新選制下的選委會改劃為五大界別，具有廣泛代表性，兼顧各界別、各階層的利益，充分體現均衡參與，更好代表香港社會整體利益。過去反對派為了搶奪議席，其選舉工程並不關注參選人的代表性，相反是政治掛帥，以參選人是否具有政治知名度、是否具有政治攪局能力為依歸，在選舉工程中更着重政治炒作，結果是不少借政治當選的選委，根本不具有業界代表性，反映了不健康的聲音，不過是政治操作當選。

夏寶龍主任在早前的講話中，對管治能力強的堅定

愛國者列出5項標準，凸顯新選制對治港者有更高要求。這次選委選舉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參選人都是業界精英，具有豐富的資歷和人脈，對於業界的訴求和問題有深入的思考和洞見，都是有能力的愛國者。更重要的是，參選人都是為了推動良政善治而參選，而不是為了政治對抗、拖政府後腿而參選。

反對派過去參選選委，開宗明義就是為了抗衡政府，更揚言要阻撓政府施政。反對派參加選舉從來不是為了良政善治，也不是為了政通人和，而是為了煽風點火。在這樣的出發點下，令到本應代表業界的選委變成兩邊陣營對陣，選舉只關心政治不關心施政，更遑論各種經濟民生矛盾。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出手修改選舉制度，就是要令選委選舉撥亂反正，讓行政立法擁有了共同的選民基礎以至管治理念，從而理順行政立法，落實行政主導，提升特區管治效能。

民主是達致良政善治的工具，但近年香港民主卻走上了歪路，變得民粹、撕裂、對抗，民主帶給香港的不是良政善治，而是動蕩不已，社會對立。中央完善選舉制度，通過擴大選委會規模，調整了界別組成，優化了產生方式，使選委會更具廣泛代表性，更好體現均衡參與，更能代表香港社會整體利益，也更能體現「一國兩制」特點。

做大碳交易市場增國際影響力

學研社成員、時事評論員 吳桐山

學研集

籌備多年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機制上月16日啓動，令全球納入交易的碳排放比例增加了一倍之多。這是中國實現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標的重要步驟，對改善空氣質量、應對氣候變化有重要意義，對中國增強國際影響力也有着深遠影響。

所謂碳排放交易，就是各家企業將自身的核證減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ER）拿出來交易。由於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減排目標，也在國際公約上承諾了減排目標，因此各國就制定了自身的碳排放配額，這些配額可以通過免費發放和拍賣分配到各家企業頭上。例如每家電力企業、石化企業每年有多少的碳排放權，都已經以配額形式分配了。那麼如果A企業通過自身努力減排了，例如每年可以排放1000噸二氧化碳，實際只是排放了900噸，減排了100

噸，那麼這個核證減排量就可以拿出來賣。

通過市場化提升減排效益

碳排放權交易可以通過市場化手段，有效提升減排的效益。為何這樣說呢？因為不同行業、企業的減排成本是不一樣的，A企業減排一噸二氧化碳需要付出1000元代價，B企業可能只需要2000元，那麼通過交易機制，減排成本低的A企業就可以盡量減排多一點，拿出來賣給減排成本高的企業。當然，隨著技術進步，各個行業的減排成本也會發生變化，但同時國家分配給各家企業的配額也會逐年減少，因為已經通過國際協議承諾逐年減排。有了交易，市場就會促使全社會實現減排效益最大化，花最少的錢辦最多的事。

中國當前在減排道路上還是任重道遠，這從碳排放權交易價格可以看到。7月16日開市後，每噸碳價只是48元人民幣，收盤價51.23元，而在碳權交易市場

成熟的歐盟，每噸碳價約為63美元，差距頗大。按照2015年《巴黎協定》的標準，全球如果要滿足到本世紀末全球氣溫上升不超過2度的目標，每噸碳價應該在40至80美元之間，中國距離這個標準仍然很遠。中國要實現減排目標，意味著各行各業要投入更多的資源去減排，讓碳價更值錢。

但中國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市場，單單是上月首批上市的2225家電力公司，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就超過40億噸，佔全球化石燃料碳排放的七分之一；今後幾年石化、化工、建材等高排放行業也會陸續納入碳交易體系，用市場力量促使各行各業減排。

中國的碳排放市場起步較晚，暫時交易規模不大，但卻有着最大的碳排放量。這意味着中國在碳排放交易上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將來隨着碳排放市場走向國際化，能夠掌握交易的主導權和定價權，對於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等有着重要意義。

美國須從中美貿易戰吸取教訓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 葉建明

參政議政



撇開美歐意識形態的喧嘩，關注這些國家主流媒體的一些經濟報道，能得到不少真實的啟示。《華爾街日報》日前說，美國30多個最有影響力的商業團體呼籲拜登政府，重啓與中國的談判並削減進口關稅。因為這些關稅「正在拖累美國經濟」。

包括美國全國商會、美國商業圓桌會議、全美零售商聯合會、美國農場主聯合會和半導體行業協會在內的30多個商業團體，致信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和財政部長耶倫，表示中國政府之前已經達到和兌現了協議中的「重要基準和承諾」，包括向美國金融機構開放市場，以及減少美國對華農產品出口的一些監管壁壘。拜登政府應該「迅速採取行動」，解決「嚴重的」關稅問題。

美發動貿易戰損害美企利益

他們表示，「由於關稅，美國企業在國內製造產品和提供服務的成本增加，使這些產品和服務的出口在海外競爭力下降」。這些組織還敦促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給予企業一些關稅豁免，並啓動一項全面降低中國商品關稅的進程。

上述消息意味着，美國政府的貿易戰的確嚴重傷害到美國企業的利益，令美國企業對其政府的不滿達到難以忍受的程度。美國全國零售商聯合會的戈爾德

說，由於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超過3000億美元的商品（包括鞋類、服裝、電子產品、自行車，甚至寵物食品）加徵關稅，許多美國零售商正在選擇消化這些成本，並擠壓自身的利潤空間。一些企業正在將這些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世界上各國間貿易關係原本是以實現互利共贏為目的，但人為製造的貿易戰必然造成雙輸。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有14億人口的市場，成長空間依然巨大。而且，應對美國的「脫鉤論」，中國也在做兩手準備，既積極擴大對外開放，也加快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努力令貿易戰和其他美國對華施壓手段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美國則不一樣。特朗普政府當初發動貿易戰，以關稅為手段，主要目的是減少美國的外貿赤字，並從中國「奪回製造業」的工作崗位。不過，幾年下來，美國的目的並沒有達到。僅從其全球貿易逆差來看，不僅沒有減少，還在拉大。2020年，美國貿易逆差達6767億美元，較2019年增長17.4%，升至12年來新高。而今年6月美國僅商品和服務貿易逆差環比擴大6.7%至創紀錄的757億美元。

就中美經濟關係來看，彭博新聞社網站評價，中美兩國正以近年來最快的速度相互輸送商品。《財富》中文網更是以《中美脫鉤聲不斷，兩國貿易卻一片繁榮》來描述。畢竟，數字不會撒謊。2020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總值4.06萬億元人民幣，增長8.8%。其中，中國對美出口3.13萬億元，增長8.4%，自美進口

9318.7億元，增長10.1%。這表明，即使在疫情陰影之下，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依然旺盛，美國的企業和消費者為貿易戰付出的代價顯而易見。

在金融業方面，美國針對中國赴美上市公司證券監管政治化，以及中國提出加強跨境監管合作，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後，有聲音擔心，兩國正在走向「金融脫鉤」。但《金融時報》卻認為，維持金融市場相互依賴的關係對中美兩國都有利。《市場動盪凸顯中國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一文說，對拜登政府延續特朗普尋求在經濟上與中國脫鉤的做法，全球資本似乎無動於衷。《華爾街日報》講得更直白，稱「中國股票可能是你（指美國人）退休儲蓄金的一部分」，因為「將部分資金投入中國股票和債券的好處，比遠離中國的理由更有說服力」，其「根本原因很簡單：中國市場很重要，而且正變得更加重要。在2021年，如果沒有中國，一個投資組合就不是全球性的」。

拜登上任後因循特朗普政府的對華經濟政策，成也敗也？不能聽信政客謊言，商家和消費者才有話語權。今天的美國政府需要從中美貿易戰中吸取教訓。和則兩利，鬥則雙輸。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甚至殺敵八百自損一千這種注定失敗的政策，但願止步於拜登政府。

熱門話題

中國和印度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疫情，兩國情況卻截然不同：中國早前只有零星輸入個案，經濟上已全面復工復產；印度感染人數於5月初持續創新高，至今患者總數超過3000萬，多地醫療系統幾近崩潰。中印是全球人口第一及第二大國，國家領土面積處於前十位，兩國皆為新興發展中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中央地方關係有所不同，能否看到兩地制度在應對疫情下的優劣？

英國1857年從東印度公司手中接管印度後，英國在對印度實施了90年的殖民統治中採用了分治法（divide and rule）。印度國土被分為眾多地方邦，並被賦予了較高的自治權。此制度在1947年印度獨立後遺留下來，形成現今的聯邦制政體。而在地方政權產生法上，印度作為「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制度上套用的是投票民主制。綜合而言，印度現時地方治理採用的制度為直接民主下的聯邦制，但此制度卻在疫情第二波爆發中暴露出致命的漏洞。

首先，因為印度通過直接投票產生地方政權，地方上的自治權爭奪應運而生。由於地方傳統及歷史性的利益交錯，地方選舉除了導致傳統政黨的比拚，更會受背後各地方利益集團的影響。同時，各個政黨的競爭更有機會產生民選官員執政黨與中央執政黨對立的局面。比如第二波疫情爆發之際，由反對黨把持的馬哈拉施特邦和恰蒂斯加爾邦同時指摘中央政府分配疫苗不足，抗疫效率低下。此舉引發由印度人民黨代表的中央政府反擊，指地方政府在混淆民衆視聽，試圖轉移地方官員抗疫不力的事實。此類黨爭頻生，難施施政實效，更遑論上下一心抗擊疫情。

與之相反，中國為單一制，中央將權力適度下放給地方政府，同時對地方治理作統籌與調整。中央政府能直接向地方官員問責，能適時替換「不作為者」。如在第一波疫情下，湖北的「一問三不知」官員被撤職之例，便能有效確保地方官員施政實效。而中國制度下，地方官員的執行力能有效配合中央政府的決策，達至功效最大化。此特質體現在第一波疫情過後，各地按需即時籌備的大規模檢測。即使只發現零星病例，各地的地方官員均按中央指令，執行市內全民檢測。在青島、大連等地，此舉成功將疫情撲滅，避免了像印度般的災難性大爆發。由此可見，相比起印度的聯邦制，中國的單一制有效減少地方執行與中央政策之間的衝突，大幅提升了地方官員的執行力。

是次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中，中國政治制度的確發揮了地方官員高度執行力，更能達至地方與中央決策的高度配合，中國抗疫取得的決定性成就在與再次陷入疫情爆發困局的印度作橫向比較之時，恰恰反映了中國制度的優勢。世界上沒有最佳的制度，只有最合適的制度，制度必須因時制宜，對症下藥，方可達到善治良治。

從疫情防控看中國的制度優勢

政賢力量青年時事評論員 梁容剛

不一樣的人生道路

崔卓權會計師事務所創辦人 崔卓權

灣區青年

我記得媽媽同我講的一句話：「我希望你有一日能夠不介懷同人講：『我會考失敗。』」這句話依然讓我記憶猶新。

我自小學成績不好，每當派成績表時總是「名列前茅」（倒過來數）。但在運動方面，無論游泳、籃球、足球，我總是比其他同學優秀。特別在游泳方面，我總比其他同學游得快，讓同學們羨慕。但當時的我其實寧願學業比同學優秀。

到了我人生第一個公開呈分試「會考」，我一直以為自己只是在校內成績不好，不代表我比其他學校學生遜色。結果放榜當天，我的會考分數比預期落差很大，不足以原校升讀。當時我非常失落，感到前路茫茫，媽媽抱着我說：「唔緊要。」但我深知當時媽媽的心情比我難受一百倍。

之後我選擇到英國升學，並下定決心用功苦幹，努力讀書，一定要拿到好成績，不再讓爸媽失望。在英國留學的日子，一開始難免覺得孤單，特別想念家人及在香港讀書的同學。畢竟兩地文化及習慣都有差異，有時候也會遭到種族歧視及欺凌。但隨着大家互相加深了解，彼此建立信任，也就能慢慢融入當地的生活。只要誠心對待別人，虛心學習，對方必定會感受到，而這也

是成長必經的階段。後來，我考入了英國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修讀電腦工程。

大學畢業回港後，我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工作了好幾年，成功考取了會計師專業資格。現在回想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日子，真是十分難忘。工作時間長不在話下，有時嚴冬出差在配套簡陋的賓館用冷水洗澡，及用牙刷代替筷子吃杯麵等。我分享以上經歷不是要讓年輕人對會計這個行業有任何誤解或卻步，我很多舊同事都沒有這種經歷；我想帶出的是這只是一個過程，辛酸的經歷會讓你變得強大，適應力更強。當然當時的我不是這樣的想法，但現在以過來人的身份回頭看，我非常感恩曾經有過這些經歷。

我希望透過我的故事勉勵年輕人：眼前的失敗、挫折、失落，都只是一個過程，不應該為一次考試，或一事情而「鑽牛角尖」，學會從錯誤中學習，改變自己，提升自己。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只要努力、堅持、務實做好每一件事，結果並不重要。

我相信每個人背後都有不同的故事，一個人成功與否不取決於他獲得什麼成就，而是在過程中他有什麼得着。

最後我要感謝我媽媽給我的無私奉獻及無限支持。

商報圖說 財政支持香港運動員是基礎也必須

精英培訓系統為運動員提供的支援總額



港隊奧運表現出色，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出五項支持體育發展措施，強調政府對體育發展支持肯定不是三分鐘熱度。

香港體育學院（簡稱體院）是協助政府向精英運動員提供世界級體育培訓及支援環境的機構。每年精英培訓系統為運動員提供的支援總額連年增加，自2016年起從不足1億元大增到3.5億元，至2020年更增至近5.8億元。相關支援對運動員生理、心理、社會支援及個人發展各個方面，其中包括直接財政資助，類近發薪。

對精英運動員的直接財政資助



現在有6個針對運動員的直接財政資助計劃，分別是精英訓練資助、殘疾人精英訓練資助、體育訓練資助、殘疾人體育訓練資助、個別精英運動員資助計劃，以及賽馬會世界錦標賽獎勵計劃，為精英運動員提供穩定的經濟環境以專心備戰和參與大型運動會。計劃涉及的財政支出同樣連年增加，從2016年的8000萬元增至2020年近1.2億元。

香港運動員能夠創出佳績，本身努力自然不可或缺，但上述財政支援讓他們得以更好發展體育，並且全職投入其中，既是基礎也是必須。